



澎湃：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

□ 李永军

“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，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之一。谁不知广东有彭湃；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？”这是1929年8月31日，中共中央在发表的宣言中，对彭湃一生作出的高度评价。能胜强敌者，先自胜者也，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。被毛泽东称赞为“农民运动大王”的彭湃，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思想上自我改造，实践中自我纠偏，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，表现出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。

在思想上坚持自我改造

彭湃（1896—1929年）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，母亲是一位出身贫苦的良善妇女，受母亲教育和熏陶，他从小就同情劳动者。1909年，彭湃进入海丰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，1913年进海丰中学读书。海丰县的五坡岭建有纪念文天祥的“方饭亭”和“表忠祠”，读书期间，彭湃经常和同学到此地凭吊这位英雄人物。到中学毕业时，彭湃已初步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。

1917年夏，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，彭湃赴日本留学。1918年9月，考入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科就读，他明确表示：“我选定此类专业，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，与同道者一起，竭尽全力，秉志改革，方不负远涉重洋，到此求学之初愿。”1919年5月，彭湃在东京参加中国留学生举行的国耻纪念会和示威游行，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，他悲愤交加，破指血书“毋忘国耻”四字。此时的彭湃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导致国家民族贫困落后的根源，他认为“当头的急务是排日”，想以单纯排日达到救国之目的。1919年9月，彭湃加入早稻田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，开始对社会主义相关的诸家学说进行研究。他赞赏并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，同时也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感兴趣。1920年10月，彭湃和李春涛等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倡议组织赤心社，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等著作，讨论俄国十月革命，表现出一心学习俄国的愿望。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，并从社会实践中不断受到教育，彭湃毅然摒弃无政府主义思想，他认为，“狭义的爱国运动是不彻底的”，主张“要解放全人类”。在1921年回国前夕，彭湃



和中国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密切联系。这时他已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。

回国后，彭湃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从事农民运动。1923年他谈到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：“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，两年前才对马氏（马克思主义）发生信仰，年来的经验，马氏我益深信。”彭湃坚持在思想上不断实现自我改造、自我完善，由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。

在实践中善于自我纠偏

在革命实践中，彭湃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主动地纠正偏差。1922年5月，彭湃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失败后，他和李春涛等人创办了《赤心周刊》，但是很快发现这一做法有很大局限性，他看到当时海丰的教育与贫民分离的现实情况，“现在的教育费，从贫民手中取出者实在不少；但贫民却连丁字都不解！”彭湃说，《赤心周刊》“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，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什么把戏”。认识到广大工农群众无法直接从《赤心周刊》中得到启示和教育后，他便放弃办刊，决定深入农村去做实际运动。家人听说他要做农民运动，大都反对，但彭湃的决心坚如磐石。他刚去农村时身上穿的是洋服、头上戴的是白通帽，农民看见他就走开，不肯和他说实话。一连跑了好几天，没有明显效果。于是他反思自

己，认识到问题后，果断作出改变：一是改穿朴实的粗布衣；二是讲俗话俚语；三是到农民来往众多的十字路口大榕树底下去宣传，这样很快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。

彭湃在指导革命斗争中很注意自我反省并及时纠正调整方略。1928年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，不少红军战士要求豁出去与敌人拼命，为死难战友报仇。彭湃也很想尽快恢复革命局面，产生了急躁情绪，并提出组织敢死队进行反攻，他自任“敢死队长”。不过，彭湃很快意识到革命处于低潮，这样干对革命是不利的，立刻纠正了这个偏差。彭湃认识到：“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是很可贵的，我们也不惜有价值的牺牲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水平仍然停留在猛打猛冲的阶段。”彭湃冷静地总结了斗争失败的教训，决定深入到大南山里发动群众，开展游击战争。

后来，彭湃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工作期间，探索总结出一系列具体的斗争策略和方法，如撰写了《雇农工作大纲》，系统分析了雇农的特性、雇农的斗争、雇农的组织和教育训练等问题。他还发表了《斗争的转变与深入》一文，强调要注重斗争转变的策略。彭湃在斗争实践锤炼中，经过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，逐步转变成熟起来，成为一名党的优秀领导人。

在利益上勇于自我牺牲

彭湃家境殷实，当地盛传彭家“有鸦飞不过的田产”。他曾自述：“我的家庭，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

主，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，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。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开口，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。”彭湃本可以过优渥的生活，却立下了“愿消天下苍生苦”的远大志向。当时的海丰籍政治要人曾邀请他去省城做官，他断然拒绝。他说：“湃的生活路，通通为湃自己塞尽了。”

彭湃曾发表了一首小诗：“这是帝王乡，谁敢高唱革命歌？哦，就是我。”充分表达了他誓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决心。1922年11月，彭湃把家里的佃农召集到一起，动员他们起来参加革命，并当众烧掉了不久前分家时分给他的田契，把自己的田地全部分给农民。这一举动，让农民们非常感动，从而更加敬重、信任他。1923年，海陆丰发生严重台风灾害，农业失收。彭湃号召农民进行“减租”运动，遭到反动军阀镇压，爆发了“七五”农潮事件，海丰总农会副会长杨其珊等农会干部被捕。杨其珊在面对反动县长的审讯时明确地说：“彭湃不是利用我们，是我们农民去利用彭湃，因为彭湃所做的事，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，他是牺牲自己利益为农民谋幸福的。”

彭湃为革命不仅奉献了自己的家财田产，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1929年8月，彭湃不幸被捕。在监狱里，面对敌人百般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，他毫不畏惧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。他在狱中寄语：“为了我们的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，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。”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强不屈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就义前，他还时刻惦记党的事业，关心同志们的安危，他在与杨殷联名写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信中说：“我们在此精神很好。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。望保重身体为要。”1929年8月30日，彭湃英勇就义，年仅33岁。他的老乡、好友，著名学者钟敬文说：“他（彭湃）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。他靠着理想活着、工作着，最后也为它欣然死去。”彭湃为大多数人数谋幸福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命，显示了他“牺牲小我，成就大我”的崇高精神境界。



又值清明

□ 高 谱

清明时节，天渐转暖，树始绿，花慢开。作为中国人，这个时间在踏青赏春的同时，都会去祭奠过世的亲友，寄托哀思，怀念故人。

作为从小便由姥爷带大的孩子，我总是会在清明时回忆起他，感恸不已，又敬歉不已。

姥爷已去世10多年，但他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却是始终清晰、明朗的。高，是第一印象。现在想想他的身高其实并没有多少，大概也就1米75多些，但因为体态总是能保持得笔直，又加上父亲和舅舅们普遍不高，因此我儿时总觉得他特别高大魁梧。从姥姥的口中，得知姥爷年轻时曾给老红军出身的首长当过警卫员，于是我的脑子里总是浮现姥爷作为警卫员跟随在首长身旁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威武神气。姥爷的脸庞也是标准的美男子模样，但罕见的是在他的左脸颊有一个用烟斗烫出的深深的圆痕。我那时在姥爷怀中，总是会用手摩挲他脸上的烙印，联想起电视里敌人严刑拷打被捕共产党员的情节，心中不禁诧异：难道姥爷也被捕过？后来才问到了答案，因为姥爷是独子，

他的父母怕孩子跑丢，才用烟斗给他烙了个记号。独子在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当中其实很少见，姥爷的父亲早逝，姥爷的母亲全靠着着他。也缘于此，在解放战争时期本来要随队伍南下的姥爷在母亲的阻拦下没有去。

若有人问我，你小时候在哪里长大的？当然，这不是在问是哪个地方人，或者是家里谁带大的，而是问幼时在哪里玩耍，有没有自己的“百草园”。我会给他一个让他吃惊又羡慕的回答，我是在烈士陵园长大的。不要奇怪，姥爷就是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第一批建设者中的一员，生前就一直住在烈士陵园分配的只有3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，与陵园一墙之隔。他总是很感慨地回忆，在陵园初建时用“柏木屑”挑水洗树的事，说屑自重就很大，水再往屑身里渗，自重就更大了，再加上水，重量压得人直不起腰。如今每每在陵园里散步，穿过现在已呈茂密森林状的柏树林，我都不禁赞叹它们从纤细柔弱的小苗到参天大树的成长过程，也不禁会想起姥爷那一代建设者是怎样一甕水一甕水地

把它们浇灌、培育起来。清楚地记得姥爷很得意地讲起过一个小故事，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南下调研途经本地时，为了方便保卫工作，往往会住在陵园的一个院落里，因为陵园本身就围墙，而且地阔人稀，环境幽静。陵园的工作人员负责院落的外围安全，姥爷说有一次一位老师从院外散步回来，看到他就叫住了他，说：“小鬼，穿衣服也不注意，风纪扣怎么不系啊。”吓得姥爷一激灵，一看风纪扣真的忘系了。自此以后，姥爷出门只要穿中山装，就会系着风纪扣，从未有漏。

年幼的我在并不理解什么是共产党，什么是共产党员时，便常常从邻居、家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话，“老范真是标准的共产党员”或者“你姥爷啥时候都跟着党”。我从这些声音中，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姥爷身上一种独有的风骨。两个例子让我记忆深刻。一是姥姥和妈妈总是不时地拿来“挪揄”姥爷的，说幸亏大舅和妈妈中学毕业的那两年，国家没有号召知青下乡，如果他们赶上了下乡，姥爷是断不会找关系找门路让他们提前返

城的，也许他们就会留在插队的地方了。二是姥爷是离休干部，医药费实报实销，但他从来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人冒他的名去医院开药，即便是80岁后常因病住院，他也总是一见好就要回家，不想给国家造成任何浪费。姥爷的4个子女，要么是工厂招工当了工人，要么是当兵复员按规定分配进了国营医药公司，要么是没有机会参加高考就自学上了电大转了干，要么是高考恢复后考上了大学成为了教师，没有一个靠姥爷走后门谋前程，淳朴正派的家风得到不断的传承。

岁月如风而逝，姥爷已离开我们10多年了。如今，在眼前，总是浮现的，是姥爷戴着老花镜，边看报纸边跟人念叨：“奔小康，奔小康，要是全国人民都小康了那该有多好啊，不知我还能不能看到哩。”想到那时那景，怎不让人泪目动容。



观浮梁古县衙

□ 王会杰

早年读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知道了江西浮梁县，当时感觉史上这个地方买卖集散，重商逐利，不然怎么讲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”呢。但不久前因纪检监察工作的需要，使我有机会亲至白居易笔下这座名城古县衙，实地观后又令我感到上述想法失之偏颇。

那一天因案情谈到廉洁文化建设，同事说浮梁县有座古县衙，就在近旁，现已辟为廉政教育基地，看一看它，也许对开展这方面工作会有所启迪。

顺着指引，只一会儿工夫，大家便来到一处古建旁边。这是个大院落，门口有石阶，两边各蹲一只石狮，张嘴瞪目，浑实厚重，看上去有些风蚀，却依然威风凛凛。门前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标识，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浮梁古县衙了。

步入院内，场面挺阔，坐北朝南的中轴线上，依次是照壁、头门、仪门、衙院以及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等六房。因瓷器茶业兴盛利厚，唐天宝元年，该县衙提为五品建制，后为历代沿袭，成为中国古代少有的高官阶县衙。衙内的一块乾隆三十三年“奉旨碑”，上面即刻着“特调浮梁正堂加五级”的字样。带着来时的期许，我们时而驻足，时而细观，试图从每处古迹中了解到我国古代郡县治理情况。渐渐地，众人的目光聚焦在一方匾额上，它上面工整写着浮梁建县以来历任知县的姓名，从上到下，长长一大串，目不暇接。据讲，浮梁县衙从唐至民国，长达1000多年，共有340余名知县在此理政，他们各有任期，作为不一，但一个共同之处是，任上竟无一人被指严重贪腐和职务犯罪，这在中国古代郡县史上是比较罕见的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在心里琢磨，300多人，1000多年，可不是少数。倘若如此，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，这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我们来不及详细了解匾额中每位知县的所作所为，但我从注意到一个人，他叫许彭年，生活在北宋时期，是浮梁所有知县中最为清廉的一位。浮梁产茶，也为瓷都，但他离任时，竟不携带任何浮梁的物品，包括一斤茶叶或一件瓷器，被当地百姓誉为“自来做知县，不买瓷器者一人”。许彭年的廉洁令人感叹，我不禁想到，这些东西在浮梁再平常不过，可许彭年偏不拿，他离任时硬是不携带任何浮梁的物品，甚至自掏腰包也不行，他把拒私的关口前移了很远。作为一县之首，许彭年的严格自律可谓得了个好头，如若不然，后任者都为瓷器茶叶系浮梁常见物件，这个知县带走一件，那个知县带走一件，你带我也带，大家都带，接着就是不带白带，千军万马白，如此发展下去，千年廉洁浮梁必将名节不保。念兹，彭年老知县，真是功莫大焉。

我们的注意力还被衙内的对联所吸引，记得刚进院，就见头门上写：“治浮梁，一柱擎天势重；爱邑民，十年踏地脚跟牢”，头门背后还题有：“地位清高，日月每从肩头过；门庭豁朗，江山常在掌中看”。走到二堂则见：“为政不在多言，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；当官务持大体，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”。我忍不住用手机把它们拍了下来，以待后品。到了三堂，一副更为有名的题联映入眼帘：“吃百姓之饭，穿百姓之衣，莫道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；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，勿说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”。中国古代官员很多出身寒门，通过十年寒窗苦读科举入仕。此题联意为：做官的要多造福一方百姓，不要欺压老百姓，因为自己是吃百姓饭、穿百姓衣长大的，归根结底自己也是个平头百姓，不要忘本。但是也别轻视官职小，虽然大多数知县是七品职级，但是它也承担着管理十里八乡人口的职责，责任重大，所以要当好这个官。当然，为了百姓也可能因得罪权贵而失掉官位，但那样也值得，应宠辱不惊。

这个题联讲得多好啊，蕴含着丰富的哲理，若是从政的人来此参观，默读此联一定会有所启示。这副名联，在河南内乡古县衙也有题存。清朝高以永曾任内乡知县，多人认为此联为高以永任内乡知县时所写，但浮梁同事认为，曾有人考证，高以永离开内乡后才写了此联，应为共有，况高以永后任户部江西司员外郎，还因劳于政务卒于官邸，于江西结缘深厚。我想，此联的可贵之处在于深刻揭示了为官之道，至于写于何处并不重要。

不觉中我们来到县衙东侧，一座门顶端悬有浮梁察院匾额的古建呈现在眼前，与县衙门一样，它大门两侧也各蹲一只石狮。由于时间短促，我们没有进去，只是站在大门前往里望了一眼，看见正对着大门也有座古建，上悬“育正堂”三个大字。据介绍，浮梁察院始建于明代，全称“九江道署浮梁察院”，冠以“九江道署”，是因为浮梁察院归九江道署管辖，它是九江道署派驻到浮梁的察院，负有巡视巡察的职责，亦即它有一定的独立行权功能，不受地方牵制。听到这里，我脑海中又出现一个问题。浮梁县衙运行千余年不出恶贪，为什么后来又派驻察院？我想，其缘由大抵是明代比较强化官吏整饬，为了避免天长日久官吏懈怠，加强了外力督察力度。一方面察院在巡察中发现官吏有问题，便在育正堂进行训诫，另一方面即便没有问题也有必要在育正堂向官员提个醒。像浮梁县这样一直有廉洁之名的县，也不能例外，因设此专司加以督促。在历史上，这个察院也是发挥了作用的。

出县衙院落，将别。回到大门前，向稍远处望去，一座红塔高高耸立，与四周低矮古建浑然一体，俊雄古朴。据讲，红塔建于北宋初年，宋代浮梁高僧佛印和尚，曾多次在此讲经说法。佛印是个名人，他和苏东坡交往甚多。有一个著名的故事，讲他与苏东坡泛舟悠闲，苏东坡见岸上小狗叼着一根骨头，便指着那狗让佛印看，意为“狗啃河上（和尚）骨”。佛印见罢，笑着把写有诗句的折扇扔进水里，意指“水流东坡诗（尸）”。多么灵机诙谐呀，而这样的智者竟出自和流连于浮梁，这确是我来浮梁之前所不甚清楚的。再忆白居易《琵琶行》里的诗句，我不禁感到，古时浮梁不仅有兴盛的商业气息，也有处世达观的人文情怀，更有令人称颂、值得传承的廉洁之风，它们在此地实现了饶有兴味的交融。

